

谭嗣同

与维新派师友

丁平一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谭嗣同与维新派师友/丁平一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6

ISBN 7-81053-763-6

I. 谭... II. 丁... III. ①谭嗣同(1865~1898)—人物研究 ②百日维新一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 B254.5 ②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7934 号

谭嗣同与维新派师友

Tan Sitong yu Weixinpai Shiyou

著 者: 丁平一

责任编辑: 肖立生

装帧设计: 吴颖辉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8821691(发行部), 8821594(编辑室), 8821006(出版部)

传 真: 0731-8649312(发行部), 8822264(总编室)

电子邮箱: press@hnu.net.cn

网 址: <http://press.hnu.net.cn>

印 装: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邵阳)

总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32开 印张: 11.25 字数: 292千

版次: 2004年7月第1版 印次: 200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书号: ISBN 7-81053-763-6/B·26

定价: 20.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总 序

朱汉民

光绪二十七年，清廷下诏全国教育改制，废书院、兴学堂，延续千年之久、遍布全国各地的书院制度被废除，而其中一部分书院则改制为近代学堂。曾在中国书院史上极富盛名、并且是“天下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经过一段学制的变更，至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样，一所有着近千年办学历史的古老书院，终于完成其近代化转型的历史使命，成为今日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所全国重点大学。

然而，岳麓书院的文化生命并没有终止，这所办学悠久的古老学府在20世纪80年代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因为岳麓书院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化价值，其遗址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在湖南大学的主持下修复原貌并对外开放，现在来此参观访问者络绎不绝，它已经成为国内外各界人士寻访中国文化的重要目的地。另一方面，岳麓书院在修复的同时又逐步恢复其培养人才、学术研究的功能，它已经成为湖南大学下属的人文学科的教学、研究基地，纳入到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体系中，并获得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所以，许许多多来岳麓书院视察、访问、考察的政界要人、学界名流，在高度赞扬岳麓书院的历史文物价值的同时，也充分肯定它作为活的文化生命的现代意义。

岳麓书院曾经有过900多年办学历史及活的文化生命。在历经种种社会变局、政治动荡之后，岳麓书院仍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而弦歌不绝，是因为她承担着使中华文化得以绵延不绝的文化创新、文化积

累、文化传播的重要功能。在社会变革、文化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岳麓书院总是立身于时代的前头，成为新兴学术思潮的基地；总是通过不断地著书、刻书、藏书，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累积宝贵的精神财富；总是通过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士人，从而完成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今天的岳麓书院作为活的文化生命，一如既往，依旧以中华文化的创新、积累、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在这所古老的庭院中，现代学人仍在参加一次又一次的学术聚会，仍在聆听一场一场的学术演讲，仍在撰写、出版一部一部的学术专著，仍在培养一届一届的读书人。这一切，都在说明一个事实：岳麓书院的文化生命不仅延续到今天，而且活出了新的意义。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岳麓书院学术文库》，其主要宗旨，就是继承岳麓书院的学术传统，继续为当代学术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尽绵薄之力。希望本文库能够传承古代书院的文化创造、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播等功能，为现代学术文化做一点添砖加瓦的工作。

当然，当代学术文化群星灿烂，我们只能根据岳麓书院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方面已经或正在形成的研究方向及特色，确立一些研究系列。本《文库》推出的第一个系列是湖湘文化研究系列。我们还将继续推出其他多个系列。本《文库》的作者队伍，除岳麓书院的在职教学研究人员、研究生以及来此讲学的专家学者外，还包括一些在本系列的研究中有学术见地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希望大家来共创今日岳麓书院的学术繁荣。

总序

目

次

上编 谭嗣同的家世生平及思想特色

- | | |
|------------------------|----|
| 谭嗣同的家世生平 | 1 |
| 谭嗣同《仁学》中的仁、通、新思想 | 10 |
| 谭嗣同政治改革思想特点 | 26 |
| 谭嗣同“冲决网罗”思想与现代启蒙 | 45 |

中编 谭嗣同与湘省维新派师友

- | | |
|------------|-----|
| 唐才常 | 69 |
| 欧阳中鹄 | 86 |
| 熊希龄 | 97 |
| 涂启先 | 106 |
| 涂儒鹄 | 106 |
| 刘善涵 | 108 |
| 邹代钧 | 113 |
| 蒋德钧 | 117 |
| 皮锡瑞 | 122 |
| 毕永年 | 128 |
| 杨毓麟 | 132 |
| 龙绂瑞 | 136 |
| 龙璋 | 136 |
| 张通典 | 140 |
| 樊锥 | 142 |

易 鼎	147
何来保	149
秦力山	152
沈 荃	154
林 圭	156
蔡钟浩	158
李炳寰	159
田邦璇	161
蔡 钙	162
杨昌济	167
曹典球	171
左孝同	175
唐才中	177
唐才质	177
刘善波	178
黎宗璠	178
邹怪贤	178
罗 棠	178

下编 谭嗣同与外省维新派师友

梁启超	189
宋 恕	217
康有为	234
陈宝箴	252
陈三立	252
江 标	261
黄遵宪	265

徐仁铸	271
徐致靖	271
汪康年	275
吴 樵	279
韩文举	281
叶觉迈	281
欧矩甲	281
李维格	281
狄葆贤	285
麦孟华	285
宋伯鲁	285
刘光第	287
林 旭	287
杨 锐	287
杨深秀	287
康广仁	287

附编 谭嗣同其他师友简介 303

毕蕤斋	杨先生	韩荪农	刘人熙
胡致廷	王正谊	黄凤岐	刘丙炎
沈兆祉	贝允昕	黄 征	谭延闿
景 廉	王先谦	邹明沅	黄忠浩
郑巖礼	李景豫	唐寿田	邱文阶
程颂万	吴小珊	饶仙槎	李正则
王信余	杨文会	吴嘉瑞	胡惟志
孙宝瑄	夏曾佑	吴德潇	杨鸿度
经元善	汪诒书	易顺鼎	释敬安

龙爪霖	唐筠庐	萧笈轩	彭云飞
郑孝胥	缪荃孙	蒯光典	刘世珩
茅子贞	徐乃昌	傅兰雅	李佳白
李提摩太			

附录 谭嗣同研究论著索引	325
后记	345

上编 谭嗣同的家世生平及思想特

谭嗣同的家世生平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佛生，号壮飞，又署名华相众生、东海寰冥氏、通眉生。谭嗣同12岁时染白喉，“短死三日，仍更苏”，故其父以“复生”字之。学佛后，又字佛生^①，表示自己信仰佛教。谭嗣同又自号“壮飞”，他在《三十自纪》中说明“壮飞”号之由来：“子云抑有言，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处中外虎争文无所用之日，丁盛衰互纽膂力方刚之年，行并其所悔者悔矣，由是自名壮飞。”^②谭嗣同在《仁学》自叙中又自称为“华相众生”，在《三十自纪》中称“东海寰冥，厥系孔多”，曾将其30岁以前著作四种集名为《东海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

谭嗣同1865年2月13日生于北京宣武门外阑眠胡同（今烂熳胡同），其时，父官户部主事。据谭家后裔谭训聪（1979年病逝台北）先生考证，浏阳谭氏明初为闽人，远祖辅佐明成祖战死，追封崇安侯，后世以武功显。明末，谭嗣同六世祖谭逢祺迁浏阳县，居于浏阳县城梅花巷丹桂坊，故邑中人称谭家为梅花巷谭氏。迁居浏阳后，世代以教读为生，至谭嗣同祖父学琴公时，因父病家贫，当过县吏职。学琴公生有四个儿子，长子继升，次子继墉，三子继洵，四子继猷，除四

子幼殇外，其余三子均有建树。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字子实，号敬甫。谭继洵年弱冠补县学生员。清道光二十九年中举人，咸丰九年成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甘肃巩秦阶道，后升按察使、布政使，官至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谭嗣同之母徐五缘，浏阳北乡炉烟洞人，她19岁时嫁给谭继洵，生有三子两女。长子嗣贻，大嗣同13岁，次子嗣襄，大嗣同9岁，长女嗣怀，次女嗣淑。徐五缘一生勤劳节俭，持家有方，教子甚严。谭嗣同从小受母亲影响甚深，养成了严于律己的生活作风。谭嗣同另有异母弟妹五人，二弟一妹幼殇，留下弟嗣罔、妹嗣嘉两人。

在京城，谭嗣同5岁开始读书，与仲兄谭嗣襄同从家塾老师毕菀斋学习。6岁时，谭继洵又聘请了一位云南的杨先生在家塾教读。8岁时，又从塾师韩荪农先生读书。9岁时，谭家迁居库堆胡同（今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10岁那年，遇到了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师，即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欧阳中鹄同治十二年（1873）中举人，次年又进京考授内阁中书。因其父与谭继洵是同乡好友，进京后他便拜访了谭继洵。谭延请他教授嗣襄、嗣同兄弟。欧阳中鹄其学服膺王夫之，谭嗣同受这位老师的影响，开始阅读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的著作，王夫之的思想学问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12岁时，谭嗣同母亲、伯兄、仲姐先后因白喉病几天内去世。亲人连续丧生，使他遭受重大打击。从此，更受庶母虐待，他自己也染喉疾短死三日，几乎丧生。1877年秋，谭嗣同父亲补授甘肃巩秦阶道，加二品卿衔。是年冬，携谭嗣同等回湖南浏阳给亡妻徐五缘修墓，这是谭嗣同首次回到故乡浏阳。1878年夏，谭嗣同随父赴甘肃，途经长沙、湖北、函谷关、潼关，过陕西，秋天抵达兰州，开始了他西北第一次行程。1879年夏，谭嗣同15岁时再次回到浏阳。是年秋，开始师从于浏阳名学者涂启先。16、17岁均在浏阳读书。涂启先给他讲授儒家经典、古文、史学以及文字、考据学，使他眼界大开，学业大进。1882年，再赴甘肃。1883年春19

岁时，遵父命赴湖北与长沙人李寿蓉（进士出身）次女李闰完婚，婚后数日，夫妻同赴兰州。居兰州臬台公馆一年，奋志读书。师从涂启先时，涂给他讲过桐城古文和魏晋文，后者更引起他的兴趣。这段时间，他进一步读了秦汉文和南北朝骈体文，确定了他以后“骈散合一”的写作倾向。他所说的“二十学文”主要是就这一点而言。

1885年至1894年，是谭嗣同疲于应试，不断奔波于湘甘、湘鄂的十年。

1885年春，谭嗣同遵父命归湖南，准备参加是年秋的乡试。经陆、水两路的长途跋涉，夏天回到浏阳。秋，赴长沙参加考试，此行乃初次赴秋闱试，试后，冬赴甘肃。是年冬，谭父调任甘肃布政使。谭嗣同农历十一月间由浏阳动身赴甘，次年正月才到达兰州藩署，到兰州后，居住在布政使署憩园一间很简陋的房子里。1886年至1887年这段时间，他一方面专心读书，另一方面，他也思考关于中法战争的问题以及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并将自己的思考写成了他最早的一篇政论文——《治言》。在这篇文章中，他将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即“道道之世。由是二千年，至于秦而一变”；“法道之世。由是二千年，至于今而一变”；“市道之世”（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以交易为道而治国之世）。以上三世乃“天之三变也”。^③他还用“忠”、“质”、“文”三个概念来说明社会在发展的不同时期的不同本质：“墨家之学出于夏，忠也；法家之学出于商，质也，而又继之以靡丽，故曰：由忠（忠诚）而质（质朴），且向乎文（文华）也。”^④文章中，还对中法战争时期人们争论不休的“和、战、守”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对待社会发展和时势的看法上，谭嗣同基本上是较传统的，并未脱出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范畴。1888年夏，他又奉父命回湘参加秋试，试后返甘。1889年春抵兰州，不久又上京师，是年在京师认识同邑进士刘人熙。是时，刘人熙任工部主事，谭嗣同素仰其学问，便拜他为师。刘人熙每天从工部归来，便给谭嗣同讲解程颐、

朱熹、张载、王夫之等先儒学理。五月间，忽然传来仲兄谭嗣襄在台湾去世的消息，谭嗣同与他二哥感情最深，听到此消息，悲痛万分，泪如泉涌，急忙赶赴上海，迎谭嗣襄灵柩运回浏阳老家安葬，并请欧阳中鹄为仲兄写墓志铭。1899年底，谭继洵升任湖北巡抚，次年春，谭嗣同由浏阳启程，经长沙到湖北，先暂住时任湖北汉黄德道的岳父李寿蓉家，为他父亲和庶母的到来做好生活上的准备。六月间，又回到浏阳，给亡兄谭嗣襄修墓，七月回武昌抚署。七月底，欧阳中鹄应谭继洵之聘，到湖北任抚院幕宾，谭嗣同又跟欧阳师学习王夫之著作。1891、1893、1894年，均奉父命回湘参加乡试，1894年乃最后一次应试。试后，即回浏阳，冬天返回湖北。谭嗣同在十年中六次参加乡试，除有一次因故未与试外，参加的五次均未中试，主要原因在于：清朝的乡试和会试都是分三场考，头场考时文（即八股文）；二场考经文（即五经内容）；三场考策论（即提出有关经文或国事等问题，要考生论述自己的见解）。虽分三场，但考官评卷时却重在时文，经文、策论只要文句通顺就算通过，所以关键在时文。谭嗣同读书历来讲求博通，而最厌做呆板又束缚人思想的八股文，但父命难违，每次都只好奉命赴考，这种不自觉的参考自然也只能名落孙山了。从他不屑于读八股时文的学习态度，也可看出他早有独立的思想。

30岁以前，谭嗣同饱受科举考试之苦，同时也游历了祖国许多地方，多次往来于河北、湖南、陕西、甘肃、山西、湖北、安徽、江苏、天津、上海等地，路途坐车坐船，经常一行就是数月，亲眼目睹了人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的情景，深感国事维艰，人民多难。自13岁第一次回故乡至30岁，17年中，谭嗣同共10次回浏阳。他在《三十自纪》中曰：“十年中至六赴南北省试，惟一以兄忧不與试，然行既万余里矣。合数都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绕地球一周。经大山若朱圉、鸟鼠、崆峒、六盤、太华、终南、霍山、匡庐无算；小水若泾、渭、漆、沮、产、灞、洮、潼、灃、蓝、伊、洛、涧、瀍、恒、卫、汾、

沁、滹沱、无定、沅、澧、蒸、淶无算；形势胜迹益无算。制情偷惰，未付简毕，退缅游乐，难忘于怀。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续此以往，仍有前之升峻远览以写忧，浮深纵涉以骋志，哀鸣箫于凌霞，翼叠鼓于华辇者乎？不敢知也。”^⑤谭嗣同在《三十自纪》中满怀感慨地记下了他在1894年以前游历过的地方和感想。30岁以前的著作，则以《治言》和《石菊影庐笔识》为代表。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湘军在辽东的溃败，使谭嗣同受到极大震动，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他提出了中国必须维新变法的主张。1895年，他写了《兴算学议》和《报贝元征》，这是他31岁时的代表著作。《兴算学议》包括《上欧阳中鹄书》和《浏阳兴算记》。在《兴算学议》和《报贝元征》中，他提出了较系统的变法主张。他从哲学的高度对变法的必然性进行了阐释，他引用了王夫之论述“道器”的一大段话，指出：“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⑥这里的“器”指的是社会现实，“道”指的是治理社会的方式。也就是说，现实社会既已发生了变化，治理社会的方式也应随之而改变。在这封信中，他还对中国的伦常提出了疑问：“中国之五伦，详于文而略于法。彼不尚文，而其法能使家庭之间不即不离，就令不无流弊，而长短适足相抵，何至如中国前跋后蹙，貌合神离，强遏自然之天乐，尽失自主之权利，使古今贤圣君子于父子兄弟之间，动辄有难处之事。”^⑦在信中，他还批评了洋务运动求“枝叶”而舍“根本”的做法；对“溺于考据词章”的学风也进行了批判；提出改革考试制度、改革官制、改革刑律，大兴工商、大办学校，更有甚者，是提出要“大开议院，有一官邑即有议院，而民气通”^⑧。他提出的“更精之策”是“筹变法之费”、“利变法之用”、“严变法之卫”、“求变法之才”^⑨。洋洋一篇近3万字的《报贝元征》书，将谭嗣同在甲午战争后受到重创而奋起要求变法的思想表

现得十分详尽。在《上欧阳中鹄书》这篇长信中，谭嗣同也表达了《报贝元征》书中同样急切要求变法的想法。他提出“变法必先从士始，从士始则必先变科举”的主张，也提出了要广兴商务、广开学校、大开议院的主张，而且表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⑩，坚定变法维新的信心。同时，在这两篇代表作中，他对清王朝日益腐朽的统治已非常不满，在《兴算学议》中说：“及覩和议条款，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⑪强烈控诉清王朝出卖国家人民的罪行。又对中国官僚的腐败进行了揭露，他借西人之口说：“西人视中国官吏比于禽兽，故有‘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之谚。又以‘秽、贿、讳’三字批评中国，一切吏治军政无不识破。”他感叹道：“君以民为天，民心之涣萃，天心之去留也。”^⑫从谭嗣同对“道、器”的论述，对议院的推崇，对清朝的不满，对中国伦常的疑义以及一系列变法维新主张来看，甲午战争以后他的思想确实发生了巨变，在他的思想深处，已孕育着反封建专制、反封建纲常的民主思想。这是与他在甲午战争以前著作中明显不同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上欧阳中鹄书》中提出了要在浏阳兴办算学馆的设想，这一想法得到了好友唐才常、刘善涵以及他的老师欧阳中鹄、涂启先的积极支持。在他的倡导下，唐才常、欧阳中鹄等人具体操办，于1895年秋在浏阳成立了算学社，从而揭开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序幕。这也是谭嗣同等将“变法之论”“先小试于一县”的首次实践结果。

1896年春，谭嗣同奉父命上京，谭父为他捐了一候补知府，原拟分发浙江省，后改派往江苏。谭嗣同在京拜访了当时显宦及知名学者。也在这年，他结识了维新派领袖人物梁启超，与梁谈论变法，志趣相投，又从梁口中了解到康有为等的变法主张。他还谒见了光绪帝师翁同和，并与其畅谈洋务。在京师，谭嗣同还结识了许多佛教学者，如吴嘉瑞、夏曾佑、吴德潇，会晤了外籍传教士傅兰雅。又曾赴天津，

参观了“船坞、铁路、铁桥、电线局、兵轮、炮台等”，还参观了“唐山煤矿、漠河金矿”。^⑬半年后，谭嗣同来到南京候补。在南京时除一度赴湖北外，他其余时间大都闭户读书，奋臂著述，其代表作《仁学》于是年开始撰写。在《仁学》中，他猛烈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猛烈批判了封建三纲五常思想，对君民关系进行了全新阐释。他抨击封建专制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⑭抨击封建伦常道：“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辄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⑮阐释君民关系道：“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⑯当时，如此猛烈地正面地对封建君主专制、封建伦常进行深刻批判，只有在谭嗣同的《仁学》中表现得最明显。梁启超称谭为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说他的思想“戛戛独造”，确非夸张。《仁学》奠定了谭嗣同在近代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这一年，谭嗣同在南京还结识了佛教学者杨文会，与杨过从甚密。冬，返鄂一行，拟与盛宣怀谈湘省开铸矿事。盛迁移行期，谭乃留鄂度岁。

1897年，谭嗣同居南京，与杨文会、刘世衍、徐乃昌、茅子贞等一起创办金陵测量学会，筹划购置仪器，旨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谭嗣同常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担任了上海《时务报》董事，为《时务报》撰文，并与梁启超等人发起成立了不缠足会，任董事。

1897年，湖南巡抚陈宝箴一再促谭嗣同回湘，赞助新政，10月，谭弃官离南京，携眷一起返湘，参加湘省维新运动，成为湘省维新派的领袖人物。

1897年11月，湖南时务学堂正式成立，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参加了学堂筹备工作。时任湖南学政的江标聘谭嗣同与熊希龄分任

总理绅（相当今天校长），熊负责主持校务，谭负赞划之责。办学经费由湘省负担，补助经费则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拨湘岸盐7000元。但当时督销局总办易顺鼎只同意拨5000元，谭嗣同致函给在籍侍郎龙湛霖与其子龙绂瑞，请龙向刘坤一争取，经过谭嗣同斡旋，经费始筹到。谭嗣同又一再函请《时务报》总理汪康年，请他同意放该报主笔梁启超和西文翻译李维格来湘就任时务学堂中、西文总教习。为时务学堂购置仪器之事，谭嗣同也多费心力。

谭嗣同回湘后，与唐才常、梁启超等人共同筹议在长沙建立南学会，谭嗣同在《上陈右铭抚部书》中将办南学会的目的说得很清楚：“湘省请立南学会，既蒙公优许，国会即于是植基，而议院亦且隐寓焉。”此议得到了省府大员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的鼎力支持。1898年2月，南学会正式成立，会所设于巡抚部院孝廉堂。皮锡瑞在1897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记曰：“谭复生等稟请开学会，黄公度即以为议院，中丞已牌示，以孝廉堂为公所，开化可谓勇矣。”^{①7}皮锡瑞之所以称“开化可谓勇矣”，主要是指南学会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谭嗣同、梁启超等把南学会作为一个参政议政机构。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湘省维新“以南学会最为盛业”，而谭嗣同等设会之意，即“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盖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谭嗣同在南学会主讲天文，虽是主讲天文，实际上天下大事、维新变法、民权平等等问题他都论及。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他：“实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①8}

1898年3月，谭嗣同又邀集唐才常、熊希龄等，私人筹集资金开办了《湘报》。《湘报》成为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在全国维新派所办的日报中亦被称为“巨擘”，发行量达到五、六千份之多，这在当时实属少有。谭嗣同担任了《湘报》董事，实际上他是《湘报》的主

要负责人。从1898年4月15日起,《湘报》开始连载了谭嗣同写的《壮飞楼治事十篇》,这十篇文章题目为:释名、辨实、学会、通情、平权、仕学、法律、财用、群学、湘粤。在十篇文章中,着重强调了办学会、开议院、改官制、合群力、变法律等主张,他的维新思想也更趋成熟。

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是湖南维新运动的三面旗帜,也是湖南维新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的标志,谭嗣同在树起这三面旗帜的过程中是功不可没的。对于湖南其他新政,谭嗣同也出力甚多,正如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所说:“若内河小轮船也,商办矿务也,湘粤铁路也,时务学堂也,武备学堂也,保卫局也,南学会也,皆君所倡论肇划者。”¹⁹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维新,起用维新人才。谭嗣同受侍读学士徐致靖保荐,应召进京。8月21日到达京师。到京后致书夫人李闰说:“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²⁰表明他一心参加变法的决心。到京后,谭嗣同与杨锐、林旭、刘光第一起被擢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被称为军机四卿,担任拆阅章奏、起草上谕的工作。并与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开懋勤殿设顾问官,代光绪帝起草开懋勤殿的诏书。殊不知光绪无实权,请示慈禧太后时,昏庸专横的慈禧大为恼火,光绪帝再也不敢提及开懋勤殿之事。新旧斗争日益尖锐,光绪帝担心“朕位几不保”,交杨锐带出密诏。谭嗣同、康有为等接到诏书后,商量对策,决定由谭嗣同去拜访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劝他为光绪帝保驾。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是维新运动史上的重要事件,袁世凯在其《戊戌纪略》中记载了谭嗣同夜访他的情况。谭当时拿出一份事先写好的拟上光绪皇帝的奏章,对袁世凯说荣禄欲“废立杀君,大逆不道”,劝说袁世凯先诛荣禄,然后派兵围颐和园,除掉慈禧“老朽”,这样国家才可保。谭嗣同置生命危险不顾,劝袁举大义,结果却为袁所告密。